



海派文化丛书

俞天白著

海派金融

 文匯出版社



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金融

俞天白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派金融 / 俞天白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9.8

(海派文化丛书)

ISBN 978-7-80741-599-2

I. 海… II. 俞… III. 金融事业-经济发展-研究-上海市

IV. F83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8490号

海派金融

作 者 / 俞天白

责任编辑 / 张 衍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张 晋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70千

印 张 / 21.75

书 号 / ISBN 978-7-80741-599-2

定 价 / 38.00元

编委会

顾问

王元化	方明伦	邓伟志	庄晓天	严家栋
吴谷平	徐中玉	钱谷融	龚心瀚	缪国琴

主编

李伦新

副主编

丁锡满 李友梅 郑家尧

编委

丁锡满	丁宏根	王晨	李伦新	李友梅
忻平	陆廷	郑家尧	桂国强	唐长发

(注：以上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列)

总序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

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开始来这一带活动。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造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城，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灵。

直至今日，上海的地名、路名依旧多有滩、渡、浜、泾、汇、河、桥、塘、浦、湾……这都在向人们证明，是水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

海洋是美丽而壮观的。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0.8%是海洋水面，如果称地球为“水球”也不无道理。海洋是广阔而有边的，是深而可测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资源的宝库……任你怎样为之赞美都不会过分。

海在洋的边缘，临近大陆，便于和人类亲密接触。我国的万里海疆，美丽而且富饶，被誉为能量的源泉、天然的鱼仓、盐类的故乡，孕育着宇宙的精华，激荡着生命的活力……任你怎样为之歌唱都不会尽兴。

上海是海。是襟江连海的不息水流造就了上海，更是水滋养了上海，使这座城市孕育了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上海，就没有这座迅速崛起的滨海城市。没有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就没有上海的迅速崛起和繁荣发达。今后，上海的发展还要继续做好这篇水文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上海是海。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是典型的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不同于在传统城市基础上长期自然形成的古老城市。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人口只有20多万，经过百年的发展，人口猛增到500多万。据1950年的统计，上海本地原住民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5%，移民则高达85%。上海的移民，国内的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的虽来自近四十个国家，但主要来自英、法、美、日、德、俄，其数量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如下几次：

太平天国期间，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了11万。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孤岛期间，仅4年时间，上海人口净增了78万。

解放战争期间，三年左右，上海人口净增了208万，增势之猛，世

界罕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产生了新一波移民潮，人口增长势头也很猛，现在户籍人口已经超过1800万，此外，还有外来务工人员600万。每年春运高峰，车站码头人山人海、人流如潮，是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是海。上海的建筑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美誉，现在是越来越名副其实了。有人说建筑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也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城市的表情。依我看，上海的城市建筑是海派文化的外在形象体现，无论是富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房屋，还是按照欧美风格设计建造的各式各样的建筑，包括集中于南京路外滩的建筑群，和分布于各区的多姿多彩的别墅洋楼，诸如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式……现已列入重点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就达300多处，或者是后来建造的如原中苏友好大厦等，都在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人文故事，演奏着上海社会发展进步史上的一个个乐章。

上海是海。上海人讲话多有南腔北调，还有洋腔洋调。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土语十分丰富。56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多元化，自然带来了语言的多样化，中国各地方言和世界各国的语言大都能在上海听到。

上海是海。上海人的饮食，可谓多滋多味，菜系林立，风味各异，川帮、广帮、闽帮、徽帮、本帮……应有尽有；西菜、俄菜、日本菜、印度菜……数不胜数。

上海是海。上海的戏剧舞台百花争艳，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歌剧、舞剧……剧种之多，阵容之齐，在国内数一数二，在国际堪称少有。浙江嵊县土生土长的越剧在上海生根开花，走向全国；而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则别具一格地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成功……

上海确实就是海！

海派文化姓海。海派文化不等于全部上海文化，而是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表现。姓海的海派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就像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大树，巍然屹立，万古长青，枝繁叶茂，这树的主干在北京，树根深扎国土，树枝则是伸向祖国各地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一种说法耐人寻味：看中华文化五千年要到西安去；看中华文化两千年要到北京去，看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要到上海去。当然，比喻总是蹩脚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在上海相互影响，有的彼此融合，有的相互排斥，有的自然淘汰，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受世界文化特别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多的中国地域文化。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明显。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如1865年10月18日在南京路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从此上海有了“不夜城”之名，1881年英商自来水公司成立，次年在虹口铺设水管，开始供水……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整体接触，尤其是租界上“华洋杂处”、“文化混合”，虽然于我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客观上却是引进西方文化早而且多，使上海成了“近代化最成功的地方，市民文化最强大的城市”，往往统领风气之先。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发展而发展的，是客观存在，有客观规律，我以为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时期：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

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化。成长时期：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转折时期：这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成熟时期：1976年，笼罩祖国天空的阴霾一举扫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结束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全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海派文化开始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

当前，海派文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这样那样前进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和弱点，这是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有哪些基本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

一是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河。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

二是创新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海派京剧的连台本戏、机关布

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则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三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特别是在“孤岛时期”，租界内某些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需要加以清醒地辨别，区别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四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综合性，是复杂的体系，不应该要求纯之又纯，水清无鱼，那就不成其为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容并存，以致落后、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在以往那特定历史时期，也夹杂其间，怎么能用这些来对今天的海派文化说事呢。

五是商业性，海派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其适应市场的商业性都有不同的表现。上海人往往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比较强，有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士，也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

我认为，海派文化的“派”，既不是派性的派，也不是拉帮结派的派，更不是其他什么派。千万不要“谈派色变”，也不必对“派”字讳莫如深，远而避之，切忌不要一提到“派”字，就联想到造反派、搞派性、讲派别！不，我们这里所说的海派文化，是反映上海文化风格的最重要流派。我国有京派文化、徽派文化、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京剧有麒派、尚派等等，越剧有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都是戏剧艺术的流派，流派纷呈有何不好。

我认为，海派文化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海派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既不要一提到海派

文化就沉醉于上世纪30年代怀旧情调中，也不要一说到海派文化马上就和当年的流氓、大亨、白相人划等号。应该看到，经历了漫长时期的风雨淘洗，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上海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派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海派文化发展的至高境界，我想就是“海派无派”，正如石涛先生所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应该要为海派文化向至高境界发展而不断努力。

时代呼唤《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是历史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当今世界，我们伟大祖国亿万人民正在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而团结奋斗，中央要求上海搞好“四个中心”建设，发挥“四个率先”作用，还要继续搞好在浦东的综合改革试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贡献，特别是要主动热情地为争取办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而努力。世界人民的目光聚焦上海，为了全面了解上海、正确认识上海，都迫切需要为他们提供新的准确而完整的图书资料。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愿望，新老上海人同样都有这个要求。可以说，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海派文化的丛书是当务之急。

《海派文化丛书》必须力求准确系统地介绍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曾经有过争议，如今也还是仁者见仁，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好事。我们编纂者则要严肃而又严格地正确把握，既不要过于偏爱，也不要执意偏见。近年来，由于上海大学领导的重视和不少专家学者热情支持，已经举行了多次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汇编出版了五本论文选集，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欢迎，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版好这套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工作一经动议，就得到作

家、编辑和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得到上海大学、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文汇出版社等大力帮助。我相信，《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可以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上海的建设增强精神助推力，同时，也可为希望全面了解上海的中外人士，提供一套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可读性而又图文并茂的图书。

我谨代表《海派文化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发行者，向所有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向读者和收藏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向读后对本丛书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的朋友鞠躬致敬！

是为序。

李伯新

2007年5月20日于乐耕堂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自序

海派金融，从远处走来

……

金融是一种文化。海派金融的内涵和外延，即它在海派文化中的个性与共性，却让我思考得很多，因为这一概念，至今还没有多少文化参照。

海派文化的首要特征，是契约精神。面对上海这个被称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汇的桥梁，我一接触这一概念，总是将中国的钱庄、票号、典当等传统钱业排除在外的，只限于现代金融业。钱庄、票号等中国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外汇的兑换与交易等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信贷体系，钱庄不吸收小额存款，缺乏聚集资金积累资本的需求，其授信业务，也只有信用放款而不搞抵押贷款。但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钱庄是凭借人事关系信贷运转的，而现代金融，却凭借严密的契约、制度，在经济领域发挥其杠杆作用。换句话说，钱庄、票号是拿熟悉的历史关系作为重要的信用值，依仗具有历史渊源的社会关系，在人情上下功夫，靠人情揽储，看面孔放贷，贷出款子的时候，连抵押和提供铺保都觉得有碍面子。现代银行则重在契约，重在借贷授信时刻的风险防范，为此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自我保护制度与措施。这是超越地域、超越社会阶层，不断扩大经济领域的必然反应，正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特征之一，是时代的必然趋势。曾经对上海经济运行发挥过相当重要作用的宁波路上密集的钱庄业，进入20世纪以后，很快被“外滩银行”——世界列强设在上海的银行业所取代，除了政治经济各种无法摆脱的强制因素以外，这种带着闭关锁国的小农经济的经营观念，不能不是自毁前程的内部原因。所以，海派金融，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文化概念。

现代金融，作为行业出现在中国大地，始于1845年。此前，在中、英、印之间，或在中、英、美之间三角贸易中承担金融周转角色的，是由那些较早与“天朝”从事贸易活动的洋行兼营的。英国和印度合资的西印度银行的分支机构，于1845年登陆华夏土地，其名称却从Bank of Western India 即西印度银行，改成了 Oriental Bank即东方银行了。但是，在这

些洋鬼子眼里，“东方”不包括上海，而是香港和广州。到了1847年（按徐润的《徐愚斋自叙年谱》中的“上海杂记”推算）方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不过到了上海，东方银行却改称为丽如银行了。这时候，上海开埠仅仅四年，在洋人的口里，上海还被称为“北华”。在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内，随丽如银行进入上海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银行，就有汇隆银行、阿加刺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等四家，都是英国的，除了丽如银行先在广州设立分支机构而后来到了上海的以外，其他三家都是先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然后南下到广州香港的，甚至像阿加刺银行，它1858年在伦敦登记之前的四年，就在上海设立分行。

但我所思考的这个海派金融，仍然将它们排除了，因为，海派金融，其主体是中国金融业、是活跃在上海的中国人开设的现代银行。

这是否指以中国通商银行开始的一批中国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确是中国第一家按照西方规范创立的银行，而且开设在上海。时间是1897年5月27日，选址于外滩6号大楼，即元芳大楼。离丽如银行开业整整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是中国深受屈辱的岁月。外资银行操纵了上海金融业，在洋务运动日见重要的“世风”面前，有识之士自办银行的冲动日益膨胀。破这一创办纪录的使命，却落在盛宣怀头上。所以，盛宣怀也就成了发轫于上海的中国现代银行的“鼻祖”。

盛宣怀充当这一历史要角绝非偶然。他出生于江苏武进，字杏荪，号愚斋。因其父在李鸿章故乡安徽庐州任知府时就与李鸿章有了交往，所以，1870年，即同治九年，即入李鸿章幕，并受到了器重。李鸿章主持洋务运动，盛宣怀就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1896年盛宣怀经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北洋大臣王文韶的保举，出任全国督办铁路事务大臣，汉阳铁厂也由他接办。加上他帮李鸿章洋务运动中所建立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他自然成为集全国轮、路、邮、电、工、

矿企业的管理权于一身的重臣，对资金运转的需求不言而喻。直接触动他办银行的诱因，却是在他督办铁路事务以后。他估计到“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而且他认为要办铁路，所办的这家银行主权不应属洋人，而应该属于自己。如果以银行为枢纽，就能够使他掌控的各种新式企业产生彼此利用和相互维系的效果，这一理解来自他对西方世界的观察，他说，“至泰西商务官有统率全国商务者无论矣，其体面大董事兼管银行、铁矿甚多，惟各为公司、各有董事、各清各账，如我轮、电、纺织各局相维不相混”。可以说，他借用西方这一套“相维不相混”的优越性，无非是为了达到趁机把手下各种事业的管理权集中于一身，强化他统率全国商务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之目的。所以，他所办的银行，必须权力最大化，他计划中的中国通商银行就包含着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发行钞票，铸造银币；二是代理国债，国债也可代洋债，办外汇，使政府“不受重息之挟制，不吃镑价之亏折”；三是汇解和收存公款。之所以说盛宣怀创办银行意在强化自己的“特等商人”的地位，是因为他在处处设想享受国家银行一些特权的同时，竭力主张银行必须商办。为此，他一再强调官办银行和发行官钞，必然得不到商民的信任，以示此建议之重要。

1896年10月，盛宣怀向朝廷呈交了“请设银行”的奏折。奏折中陈述，“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还说，“现今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这份奏折，还没有获得朝廷的“恩准”，便引发了从国内到国外、从京城到上海、从满清皇亲国戚到汉族重臣的轩然大波！

首先是来自英、俄、法、奥、日本等侵华列强的阻挠。反应最快的是利益最为直接的英国。长期代表英国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的人叫赫德。

一听到消息，他马上热情可嘉地提出了一个相对应的建议：招募华资开办中英银行。这是很有卖点的主意，因为这家银行必定享有海关税款的保管权，成为银行有力的后盾。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以合办名义，扩充由他主管的海关权势范围，进一步控制中国财政金融大权。刀锋直指通商银行。因为他们掌握着海关，设立银行的主意由他们提出来的话，对华商吸引力必然超过中国通商银行，使还没有招募股款的中国通商银行胎死腹中。盛宣怀深知这一招的厉害，大声疾呼，直揭赫德的阴险用心，提醒当局，“闻赫德觊觎银行，稍纵即逝”，“利权旁落，甚非所宜”！

清廷的态度如何呢？

面对即将诞生的中国通商银行的心理，和赫德之流同样阴暗。一些皇亲国戚，面对新式企业不断出现的社会潮流，担心这家银行一设立，财政大权必落于汉人之手，自然对盛宣怀的计划刻意刁难；总理衙门中那些极端守旧的顽固派，却担心银行会造成混乱，动摇了“国本”。这些势力汇合起来，针对盛宣怀拟送的22条章程，挑剔、责难和限制之词，铺天盖地地抛向盛宣怀：总行设在远离京都的上海，是何用心？银行经营亏损了，谁来负责？报效朝廷的利润，为什么只有区区二成，而不是五成？朝廷是否可以随时向银行借到巨款，比如十万、百万？等等。盛宣怀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面对压力，却以退为进，以从此不管银行的事务为要挟，同时，暗中请求李鸿章、翁同龢、王文韶等重臣疏通。终于迫使这些反对者让了步。但在银行即将开业的前夕，御史管廷献忽又呈上一份奏折，发出了“银行官设，流弊宜防”的警告，于是清廷重新陷入银行“究竟利弊如何”的困惑中，责成王文韶和张之洞重新审议。

这一招，正中张之洞的下怀！这位占据长江中下游地理优势、独霸湖北、江浙一带银币流通权的湖广总督，早已暗中为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心怀抵触了，因为铸造银币一项是直接损害他的利益的。如果中